

21 世纪“混合战争”场景下 国际舆论博弈剖析及启示

——兼评乌克兰危机期间美西方对俄国际舆论战^[1]

林斯娴

【内容提要】乌克兰危机被国际战略界定义为一场典型的“混合战争”。在此过程中，美西方与俄罗斯及双方主流媒体之间展开了一场斗争异常激烈的“舆论战”，展示了诸多新特点。此情形下的国际舆论战不但功能增大增强，对战争进程和结局的影响也更大。美西方借助其资金、技术及媒体新装备优势，从战区外向其“国际代理人”提供舆论支持，大肆诋毁抹黑对手和超量传播虚假信息今后将是“混合战争”条件下国际舆论战的新常态。深入研究乌克兰危机期间美西方势力遂行的这场对俄舆论战，对于深入认知 21 世纪“混合战争”场景下国际舆论战的表现形式、特点及其发展趋势，研究未来外部势力在类似条件下打一场以中国为对手的国际舆论战的可能性及其手法与特点，具有警示与启示意义。

【关键词】混合战争 舆论战 乌克兰危机 美西方 俄罗斯 国际传播

【作者简介】林斯娴，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中心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241 (2024) 03-0132-22

[1] 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战略竞争背景下美西方对华舆论战研究”（项目编号：2023JJ037）的阶段性成果。作者感谢《和平与发展》匿名评审专家及编辑部对本文提出的修改意见，文中错漏概由本人负责。

2022年2月俄罗斯对乌克兰突然采取“特别军事行动”后，乌克兰危机再次爆发并迅速演变为一场实体军事战争。一方面，牵涉国家除了交战双方外，美西方国家纷纷卷入其中，战事延宕至今两年多仍未结束。另一方面，传统战与非传统战形式多样、相互交织、交锋激烈复杂。在此次乌克兰危机中，各国军事部门、学术界、舆论界纷纷将俄乌之间以及俄罗斯与整个西方阵营之间全方位、多领域的对抗定义为一场“混合战争”。随着21世纪世界多极化、全球化、信息化和智能化的迅猛发展，世界联系日益紧密、国家利益相互交织，难以真正“脱钩”。例如，作为世界最大两个经济体的美国和中国，几十年来“互动”频繁，相互交织的利益太多，仅中国的发展就给美国等众多国家带来了巨大的市场机会。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战争的关联因素显著增多、复杂性不断增强，政治、经济、外交等因素对传统战争的影响和制约愈发突出。“混合战争”的出现与演进，是当前世界范围内军事与非军事要素的联动性、依赖性进一步加深，战争的综合性和整体性大大增强，战争的内涵与外延正在超越和突破传统战争概念和形式的必然反映。

“混合战争”作为一种更加隐秘、不易察觉的战争形式，有可能在今后的国际地缘政治博弈中成为一种新常态。而国际舆论战作为“混合战争”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其重要性近年来迅速凸显，且呈现出新的形态与特点。此外，国际舆论还普遍认为，乌克兰危机是一场“代理人战争”，不但俄罗斯这样看^[1]，美西方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2]因此，乌克兰危机中美西方与俄罗斯之间展开的国际舆论战，其实质也是一场美西方以乌方为“国际代理人”向俄罗斯进行的一场“国际代理人舆论战”。目前，乌克兰危机中国际舆论战的胜负虽然尚无定论，但其后果和影响突出，使各国显著认识到舆论战对国家安全产生的威胁不可小觑。当前，在南海、台湾等问题备受

[1] Таран И., Лобанов М. «Радикально не изменит ситуацию»: зачем Пентагон сообщил о деталях поставок американского оружия на Украину // URL: <https://russian.rt.com/world/article/1008307-pentagon-oruzhie-ukraina-politika>, 28.05.2022.

[2] Ivo H. Daalder and James M. Lindsay, “Why Putin Underestimated the West and How to Sustain Its Newfound Unity,” *Foreign Affairs*, April 7, 2022,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russian-federation/2022-04-07/why-putin-underestimated-west>.

关注并成为潜在冲突热点的情况下，深入研究乌克兰危机场景下美西方及其主流媒体与俄罗斯及其主流媒体之间的这场国际舆论战，有助于我们从更高的站位、更前瞻的视角，深刻认知和把握在 21 世纪“混合战争”场景下国际舆论斗争的诸多新特点，从而未雨绸缪，为应对未来日益激烈的国际舆论博弈预谋应策。

一、“混合战争”的概念、演进及主要表现

关于“混合战争”的含义，目前尚无统一定义。许多文献都对“混合战争”做出了各种解释，不同的战略问题专家、军事分析家也对其概念有不同说法。综合各方面的解释，本文认为对“混合战争”可以理解为交战双方尽可能综合运用各种军事和非军事手段压制和击垮对手，最终赢得战争的总体胜利。

“混合战争”的理论源于美国，但引起了俄罗斯的重视并对其进行发展和实践运用，成为俄罗斯反制美国的新战略手段。美国在 2005 年发表的《美国国防战略》报告中，最先提出了“混合战争”的概念，指出未来最有实力的对手可能会将破坏性能力与传统、非常规和毁灭性作战样式结合使用。^[1]2007 年，由美国海军、海军陆战队和海岸警卫队联合发布的《21 世纪海上力量合作战略》首次把“混合威胁”视为现代战争新的威胁形式。^[2]同年，美国著名军事专家弗兰克·霍夫曼（Frank Hoffman）在《21 世纪冲突：混合战争的兴起》一书中首先系统地探讨了“混合战争”的理论，指出未来美军将要面对的是一种混合型的战争，即政治斗争、常规战争、非常规战争及其他影响方法（如新闻战、外交战、法律战、政权颠覆、干预选举等）将被组合在一起以实现战争目标。^[3]北约在其相关文件中则将“混合战争”定

[1]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The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March 2005, p.2. <https://history.defense.gov/LinkClick.aspx?fileticket=VRrIZ8A1tNo%3d&tabid=9117&portalid=70&mid=20233>.

[2] United States Navy, *A Cooperative Strategy for 21st Century Seapower*, October 2007.

[3] Frank Hofman, *Conflict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Rise of Hybrid Wars*, Arlington: Potomac 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 2007.

义为“将常规以及非常规的力量工具和颠覆工具相互作用或融合，以协同方式混合使用，利用对手的弱点并达到协同效果”。^[1]该定义中的“常规力量工具”，指直接使用军事力量；“非常规力量工具”则指包括科技、经贸、金融、资源、传媒、网络、信息、宣传、心理、情报等在内的各类非军事手段，也包括所谓的“代理人战争”。其中系统运用传媒、网络工具和信息、宣传、心理、情报等手段，针对对手开展国际舆论战，正是运用“非常规力量工具”争取“混合战争”胜利的一种战争形式。

就此而论，这种“混合战争”的残酷程度，毫不亚于以往具有决战性质的任何一场实体军事战。人类战争史上曾实际发生过多次“混合战争”，在两次世界大战及冷战时期美国对外发动的相关战争中，敌对双方在进行实体军事战的同时，也都展开了经济战、金融战、科技战、文化战、情报战、心理战、信息战、舆论战等非军事领域的战争，其中舆论战对战争进程有很大的影响。而“9·11”事件后，美国为推动构建其统治下的单极世界，以反恐名义于 2001 年和 2003 年先后发动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在战场上美国取得的胜利虽然毫无争议，但这两场战争却大幅削弱了美国的力量，尤其是其软实力和国际形象大为受挫，并刺激国际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势力迅速兴起。面对中东地区的复杂形势，美国意识到常规军事作战已无法有效应对来自多元化对手的混合威胁，并在战争实践中逐步形成了“混合战争”理论^[2]，极大地发挥了信息战、舆论战、心理战等手段的效能。

俄罗斯对于“混合战争”的研究，一直到 2013 年才展开，但呈现后来居上的态势。2013 年俄武装力量总参谋长瓦列里·格拉西莫夫（Valery Gerasimov）发表文章认为，战争的界限变得模糊，确定战争状态愈加困难，常规军事手段需要政治、经济、信息、人道主义及其他非军事手段的

[1] Weilong Kong and Tim Marler, “Ukraine’s Lessons for the Future of Hybrid Warfare,” *The National Interest*, November 25, 2022,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ukraine%E2%80%99s-lessons-future-hybrid-warfare-205922>.

[2] 徐舒悦、高飞：《乌克兰危机背景下“混合战争”理论与实践评析》，载《和平与发展》2023 年第 4 期，第 77 页。

支持。^[1]2016年,他对自己的观点进行了修订,分别发表题为《科学技术在战争规律预测中的价值》^[2]及《混合战争需要高技术武器和科学论证》^[3]两篇报告,系统阐述了俄军对“混合战争”的理解,指出现代战争所使用方法的重心越来越向综合使用政治、经济、信息及其他非军事措施方向转移。他的一系列观点得到俄军方的重视并付诸实践,俄军还创造性地使用“格拉西莫夫战法”(Gerasimov Doctrine),2014年在克里米亚危机及乌克兰东部的军事冲突中取得了良好效果。例如,打电子战,在向克里米亚运送武装力量时实行严格的无线电静默制度,使北约的情报部门无法及时察觉俄军动向,从而赢得了宝贵的行动时机;打舆论战,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对外宣传,以获取国内外舆论支持、反制西方的抹黑、占领道义高地;打法理战,在法理上指出乌克兰反对派推翻亚努科维奇政府是“违法”行为,同时极力渲染克里米亚“脱乌入俄”的合法性;打经济战,以截断天然气供应、催还巨额债务作为牵制和施压当时乌克兰波罗申科政府的有效手段;打外交战,在采取军事行动前积极开展外交活动,与各方磋商谋求利益共同点,以期获得国际社会支持,为达成战略目标铺路。随后2015年俄罗斯也在叙利亚创造性地实施了政治军事战、特种战、信息战等俄版“混合战争”作战新样式应对美国,同样收效明显,例如采用高新技术,完成了“世界上首次以战斗机器人为主的攻坚战”等。^[4]

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爆发后,美西方国家和俄罗斯都把此次俄乌冲

[1] Valery Gerasimov, “‘The Gerasimov Doctrine’ and Russian Non-Linear War,” *Military-Industrial Kurier*, February 27, 2013, <https://inmoscowshadows.wordpress.com/2014/07/06/the-gerasimov-doctrine-and-russian-non-linear-war/>.

[2] Valery Gerasimov, “The Value of Science Is in the Foresight: New Challenges Demand Rethinking the Forms and Methods of Carrying Out Combat Operations,” *Military Review*, January-February 2016, pp.23-29.

[3] Valery Gerasimov, “Hybrid Warfare Requires High-Tech Weapons and Scientific Substantiation,” *Military Industrial Courier Online*, March 9-15, 2016.

[4] 高凯、赵琳:《“混合战争”——俄罗斯新战略博弈手段》,载《军事文摘》(半月刊)2019年第12期。

突定位为“混合战争”。^[1]美西方从战争伊始即有意推动乌克兰危机朝着“混合战争”方向演进，企图综合运用各种军事和非军事手段，尤其是国际舆论战等，将“各类战争工具整合进一个框架”，对其“优点加以利用”，以期从根本上削弱甚至击垮俄罗斯。^[2]俄方也清醒地认识到美西方国家是在针对自己打“混合战争”。^[3]面对美西方的猛烈舆论围剿，俄方也以牙还牙、不甘示弱，着力采取多种反制措施，与美西方势力展开激烈的国际舆论博弈。

二、乌克兰危机期间国际舆论战的主要特点

将舆论用作国家间的斗争手段有着悠久的历史，而“舆论战”概念的形成则是近百年的事。20 世纪 20 年代，美国著名政治学和传播学专家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例，指出舆论宣传与军事压力、经济压力一道，是“反对一个交战敌人的行动中的三大工具”，是一种“思想对思想的战争”。^[4]随后，舆论作为一种战争手段，从理论和实践上受到了愈来愈多的重视。所谓“舆论战”，即敌对双方通过控制、利用各种传播工具，对涉及战争的最大问题进行导向性宣传的舆论对抗，通过有计划、有组织的宣传引导，不断改变敌对方的思想态度，削弱敌对方的斗志士气。^[5]可以说，国际舆论战是“不见政府的影子，也不见战火硝烟，

[1] Бордачев Т. Россия — европейская страна, но гибридная война Запада заставила ее повернуться к Азии // URL: <https://newsclick.ru/timofej-bordachev-rossiya-evropejskaya-strana-no-gibridnaya-vojna-zapada-zastavila-ee-povernutsya-k-azii/>; Joseph S. Nye, “Eight Lessons from the Ukraine War,” Project Syndicate, June 15, 2022,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russia-war-in-ukraine-eight-lessons-by-joseph-s-nye-2022-06>.

[2] Weilong Kong and Tim Marler, “Ukraine’s Lessons for the Future of Hybrid Warfare,” *The National Interest*, November 25, 2022,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ukraine%E2%80%99s-lessons-future-hybrid-warfare-205922>.

[3] Бордачев Т. Россия — европейская страна, но гибридная война Запада заставила ее повернуться к Азии // URL: <https://newsclick.ru/timofej-bordachev-rossiya-evropejskaya-strana-no-gibridnaya-vojna-zapada-zastavila-ee-povernutsya-k-azii/>.

[4] [美]拉斯韦尔：《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张洁、田青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第 1 版，第 22—23 页。

[5] 朱金平：《舆论战》，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6—7 页。

却能给民众洗脑，瓦解敌对国家民众的心理防线，继而颠覆政权，其效果甚至大于军事打击，且投入少、伤亡小，还能占领政治与道德制高点”。^[1]例如，在1991年海湾战争中，美国就曾充分利用舆论战和心理战，一方面对国内外媒体报道大加操控，只允许报道对自身有利的内容，使战时的美国媒体“更像美国国务院的公关部门”^[2]；另一方面不断研发新型传播工具，如投送改装的“EC-130”播音飞机至伊拉克守军阵地，连续播放“精心制作”的广播、电视节目，瓦解伊方的战斗意志。^[3]

值得注意的是，在乌克兰危机背景下的“混合战争”中，一方面，对峙双方各自拥有毁灭性的核力量，这对美西方一向主张的在战争中“暴力无限制使用”原则构成了极大制约，因此，双方都不得不对各自在实体军事战中的暴力使用进行限制，转而按“有限战争”模式使用军事力量。但另一方面，美西方在与俄罗斯的舆论交锋中，对包括舆论战在内的非军事力量的使用却越来越不受限制，采取了所谓“暴力无限制使用”的“绝对战争”模式。^[4]美西方国家及其媒体、精英、政要等针对俄罗斯政府、军队有组织、大范围地展开系统性舆论战，并重点对俄总统普京进行系统性舆论攻击，如称他怀有“帝国梦”，一心要恢复“俄罗斯帝国”，企图“把讲俄语的人全都重新聚合起来”等等^[5]，甚至不惜违背基本国际礼仪、惯例，用激烈的言辞指控普京“失去理智”“偏执”、有“妄想症”。^[6]

[1] 杨志平、马廷魁：《媒介单边战：“9·11”事件背景下西方媒介对异质文化的形象构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1页。

[2] Ella Shohat, *The Media's War*, Social Text, 1991, (28), pp.135-141.

[3] 朱金平：《舆论战》，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05年版，第44—45页。

[4] “暴力无限制使用”原则和“绝对战争”论，都是19世纪普鲁士军事理论家在其军事理论名著《战争论》一书中提出的战争观，并长期被美欧日等西方国家战略界及其军事理论奉为主臬。参见[日]伊藤宪一：《国家与战略》，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译，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年10月版，第48—60页。

[5] Thomas L. Friedman, “I See Three Scenarios for How This War Ends,”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1, 2022, <https://www.nytimes.com/2022/03/01/opinion/ukraine-russia-putin.html>.

[6] Neel Dhanesha, “How to Think about the Risk of Nuclear War, According to 3 Experts,” *Vox*, February 27, 2022, <https://www.vox.com/22951004/nuclear-weapons-russia-ukraine-war-putin>.

针对上述攻击，俄方也不甘示弱，积极予以反击。俄方主要通过总统普京等的公开谈话以及塔斯社、俄罗斯卫星通信社、“今日俄罗斯”电视台、《新消息报》《共青团真理报》、“俄罗斯总统网站”等“国家媒体”、社交媒体系统发声，对种种指责予以辩驳，甚至在一些场合抓住美西方及乌方政治、经济、战略方面的“痛点”开展舆论反击。如俄方曾多次指责北约持续东扩对俄安全构成重大威胁；乌克兰当局进行“种族屠杀”^[1]，“奉行侵略性的恐俄症和新纳粹主义”^[2]；谴责美西方长期奉行殖民主义统治，“欺压发展中国家”^[3]；甚至还列出证据，指控美国在乌克兰实施了规模庞大的“军事生物计划”，企图对俄罗斯及其他敌国进行违禁的“生物战”，危害国际安全。^[4]

总之，在这场战争冲突中，以美西方及其主流媒体为一方，以俄罗斯及其主流媒体为另一方，对峙双方为配合其在乌克兰战场的实体军事战，都全力以赴展开了国际舆论战史上极为罕见的激烈、冷酷甚至背离客观公正和道德原则的舆论搏杀。双方开展舆论战的手段丰富多样、技术先进且无所不用其极，包括精心设置媒体议程；综合运用各类传统媒体和新媒体，采用以多对一的结群攻击；按照“符号政治”逻辑，海量制造和传播各类用以污名化、妖魔化对手的“新标签”“新符号”，而不论其是否属于虚假信息、是否属于舆论欺诈。

此次俄乌冲突中，美西方对俄罗斯开展的舆论战主要呈现以下特点：

（一）“混合战争”便于美西方联合盟友利用舆论攻击对手

在国际舆论场上，美西方一向惯用以多对一、结群攻击对手的战法。在

[1] Колесникова О. Владимир Путин оценил спецоперацию на Украине на встрече с лидерами фракций Госдумы // URL: <https://rg.ru/2022/07/07/zapad-uzhe-proigral.html>, 07.07.2022.

[2] Путин В.В. Обраще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 URL: <http://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67828>, 21.02.2022.

[3] Путин В.В. Пленарное заседание Восточного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форума // URL: <http://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69299>, 07.09.2022.

[4] Гришин А. Холера и сибирская язва: Украина готовила биологическое оружие по заказу США // URL: <https://www.kp.ru/daily/27373/4555101/>, 07.03.2022.

乌克兰危机中，它们依仗西方媒体在技术、规模和话语权上具有优势等条件，集结数十个西方国家及其媒体抱团结伙，群起攻之，力图用国际舆论战配合乌克兰的对俄实体军事战。从媒体的综合实力对比看，美西方势力从一开始就拥有以多对一的数量优势。2022年4月20日，美国《外交》杂志网站发表一篇题为“如果乌克兰战争不结束怎么办？”的文章，其中披露：截至2022年4月，有37个西方国家参与了对俄制裁。^[1]这些国家的媒体及其政要、网红等自然也成为积极投入对俄舆论战的主力。不仅如此，美西方势力还拥有资金、技术、人力、媒体与网络优势，包括控制着“脸书”（Facebook）、“优兔”（YouTube）、“推特”（Twitter，现更名为“X”）等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社交平台。“电报”（Telegram）社交软件的创始人和控制者虽是一对俄罗斯兄弟，但他们早已十分“西化”，与美西方站在一边，“电报”在美西方对俄舆论战中的作用甚至超过“脸书”“优兔”“推特”，成为对俄造成更大伤害的国际舆论造势平台。^[2]随着冲突的延续，为配合对俄军事实体战，上述社交媒体不断鼓励乌克兰普通民众向军方报告俄罗斯军队的动向，并将战况信息传播到世界各地，以渲染俄罗斯军队的“残暴”。由于“数百万用户同时在线更新”，配合美西方各主流媒体“急切报道与社交媒体同步的新闻”，大量针对俄方的负面信息充斥网络，全方位包裹新闻受众，甚至一度导致部分受众由于阅读太多同类消息，产生对乌克兰的“同情疲劳”现象。^[3]

（二）美西方势力对俄国际舆论战目的明确、话术统一

美西方对俄罗斯敌视心态强烈，必欲通过国际舆论战，配合其“代理人”

[1] Liana Fix and Michael Kimmage, “What If the War in Ukraine Doesn’t End?” *Foreign Affairs*, April 20, 2022,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russian-federation/2022-04-20/what-if-war-ukraine-doesnt-end>.

[2] Vera Bergengruen, “How Telegram Became the Digital Battlefield in the Russia-Ukraine War,” *Time*, March 21, 2022, <https://time.com/6158437/telegram-russia-ukraine-information-war/>.

[3] Magdalene Karalis, “The Information War: Russia-Ukraine Conflict Through the Eyes Of Social Media,” *Georgetow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February 2, 2024, <https://gjia.georgetown.edu/2024/02/02/russia-ukraine-through-the-eyes-of-social-media/>.

的军事实体战，瓦解俄罗斯军队，并损毁俄形象、削弱其国力。美国《外交》杂志网站的文章宣称，对俄制裁非常适用于“推动俄战争机器的长期衰落”^[1]；2022年5月美国《外交政策》网站的一篇文章呼吁，“西方应该继续施压，让俄‘重回笼子’”。^[2]在战争持续两年仍无法结束之际，以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Stoltenberg）等为代表的西方要人甚至已失去耐心，开始策划怂恿乌克兰使用西方武器直接攻击俄罗斯本土。^[3]在美西方对俄实施舆论战的过程中，大量类似的文章、报道、评论、访谈和电视广播节目不断出现，普遍使用充满敌意与恶意的观点及措辞，寄望于通过此次战争造成俄罗斯的衰落。美西方不仅企图通过以相似的话术铺天盖地对俄实施舆论“轰炸”，给俄民众“洗脑”，瓦解其心理防线，占领国际政治与道义高地，还企图从根本上摧毁俄国家和军队，甚至促俄走上第二次分崩离析的道路。这种舆论战的目标、模式及其实施过程，反映出美西方对俄罗斯怀有强烈的“不共戴天”敌意。

（三）美西方势力以阵营划线、以攻为守，力图挽救自身日渐衰落的地位

在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的“混合战争”中，美西方针对俄罗斯的群起而攻之的舆论攻势，除与美西方固有的所谓“盟友一致”行为模式相关外，更与其综合实力愈益衰落而希冀阻止这一趋势、守住其在国际事务中的优势地位有关。冷战结束时，美西方国家的经贸总量一度占全球的四分之三，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一度高于发展中国家数十倍。到2022年，西方发达国家经贸总量的全球占比已降至不足全球的一半，人均GDP已从过去相当

[1] Magdalene Karalis, “The Information War: Russia-Ukraine Conflict Through the Eyes Of Social Media,” *Georgetow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February 2, 2024, <https://gjia.georgetown.edu/2024/02/02/russia-ukraine-through-the-eyes-of-social-media/>.

[2] Emma Ashford and Matthew Kroenig, “What’s the Endgame in Russia’s War With Ukraine?” *Foreign Policy*, May 13, 2022,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2/05/13/endgame-ukraine-russia-war/>.

[3] “NATO’s boss wants to free Ukraine to strike hard inside Russia,” *The Economist*, May 24, 2024, <https://www.economist.com/europe/2024/05/24/natos-boss-wants-to-free-ukraine-to-strike-hard-inside-russia>.

于发展中国家的数十倍剧降至5倍左右。^[1]因此,美西方国家保住其当前的经济、贸易、金融、科技及军事优势成为当务之急,其“支乌打俄”是为了维护其全球政治、文化、军事优势及西式民主的基础,也是西方发达国家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核心矛盾,而非如美国所说是为了维护所谓“欧洲及世界和平”和“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是“民主与专制”的斗争。^[2]俄罗斯公开揭露了美西方搞“新殖民主义”的实质和霸权野心^[3],挑战了美西方护持其经济、政治、文化、军事霸权,引起美西方惊恐并不得不一全力反击。

对于乌克兰危机的责任方,广大发展中国家实际上看得一清二楚。一方面,美西方在冷战后违背政治承诺,推动北约不断东扩,对于乌克兰危机的缘起及其爆发、冲突升级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另一方面,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势力通过遏制和打压俄罗斯,企图继续维护其自身的全球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科技优势。因此,美西方针对俄罗斯的集中猛烈的舆论攻击,并未得到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积极响应。

(四) 美西方加大高新传媒技术投入,制造单向透明“信息茧房”

在乌克兰危机背景下美西方针对俄罗斯开展的这场国际舆论战过程中,虽然美西方势力具有优势的传统媒体,其报刊、广播、电视依然作用巨大,但各类网络媒体、社交媒体、融媒体、移动应用等高新传媒技术异军突起,扮演了主力军角色。美西方为确保对俄舆论战的主导权,达到封禁俄方声音、诋毁俄国际形象的目标,着力对高新传媒技术加大投入,特别注意发挥其所拥有的装备、技术及资金优势,并由此为其受众打造了一座单向透明的“信息茧房”。

[1] DataBank, The World Bank, <https://databank.worldbank.org/home.aspx>.

[2] Joergen Oerstroem Moeller, “Ukraine Presents an Opportunity to Forge a New Global System,” *The National Interest*, March 20, 2022,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ukraine-presents-opportunity-forge-new-global-system-201293>.

[3] Moscow (AFP), “Putin proclaims end of ‘ugly neo-colonialism’,” France 24, June 20, 2023, <https://www.france24.com/en/live-news/20230616-putin-proclaims-end-of-ugly-neo-colonialism>; Jade McGlynn, “Why Russia Markets Itself as an Anti-Colonial Power to Africans,” *Foreign Policy*, February 8, 2023,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3/02/08/russia-ukraine-colonialism-diplomacy-africa/>.

一是充分发挥各类网络媒体、融媒体、社交媒体、移动应用等高新传媒技术和载体优势，包括“推特”“脸书”“优兔”等网络社交平台、应用程序的舆论造势功能，为其实施“打俄支乌”战略造势。在此过程中，美国政府甚至采取了机会主义立场，对一向受其打压的中国企业旗下的 TikTok 一度“法外施恩”，采取认可姿态，将“网红”在该平台上发布的反俄内容“视为美国人了解乌克兰危机及其进展的‘重要方式之一’”。^[1]但讽刺的是，2023 年 10 月巴以大规模武装冲突爆发后，TikTok 同样成为美国及全球民众了解加沙地区情况的重要窗口，并因此导致美西方“煽动民众支持以色列的公关行为”表现得“极为糟糕”，美国内多次出现声援巴勒斯坦的抗议活动，而这种“反噬”效应成为美国近期极限打压 TikTok 的重要原因。^[2]

二是不惜工本精心包装“电报”等应用程序，使其成为报道乌克兰危机、对俄开展舆论战的“数字作战空间”和“信息中心”。在美西方的包装和支持下，“电报”上的俄语频道用户骤增，乌克兰危机突发后仅一个多月就达到了 800 万户。^[3]目前“电报”全球用户即将突破 10 亿，乌克兰危机是其用户激增的重要原因之一。据最新统计，72% 乌克兰民众将“电报”当做首要信息来源。^[4]

三是全力压制俄“国家媒体”以及一切同情、支持俄的声音，以保障美西方在对俄舆论战中的主导地位，排除对俄大打“污名化”“妖魔化”舆论战

[1] Sarah E. Needleman and Deepa Seetharaman, “TikTok Influencers Get Spotlight in Information Battle Over the Russia-Ukraine War,”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March 13, 2022, <https://www.wsj.com/articles/tiktok-influencers-get-spotlight-in-information-battle-over-the-russia-ukraine-war-11647185447>.

[2] Nikki McCann Ramirez, “Lawmakers Admit They Want to Ban TikTok Over Pro-Palestinian Content,” *Rolling Stone*, May 6, 2024, <https://www.rollingstone.com/politics/politics-news/lawmakers-tiktok-ban-pro-palestinian-content-1235016101/>.

[3] Vera Bergengruen, “How Telegram Became the Digital Battlefield in the Russia-Ukraine War,” *Time*, March 21, 2022, <https://time.com/6158437/telegram-russia-ukraine-information-war/>.

[4] Cristian Segura, “Ukraine considers banning Telegram if app is confirmed as threat to national security,” *EL PAÍS*, April 2, 2024, <https://english.elpais.com/international/2024-04-02/ukraine-considers-banning-telegram-if-app-is-confirmed-as-threat-to-national-security.html>.

时受到的干扰和制衡。如乌克兰危机爆发初期，当时的“推特”就以监测到“协调统一的作弊行为”为由，封禁100多个明确表态“#IStandWithPutin”（我支持普京）的私人账号^[1]，随后又封禁了300多个俄政府官方账号，甚至包括普京本人的账号。^[2]撰写出版了两本有关普京书籍的德国记者休伯特·塞佩尔被美西方主流讥讽为“普京鉴赏家”，多家西方媒体不顾作者本人申辩，联合指控他从俄方“秘密”收取赞助。^[3]美国“福克斯新闻”前主播塔克·卡尔森（Tucker Carlson）也因为多次质疑美西方势力支持乌克兰，并严厉批评西方媒体报道“总是采用一面之词”，“从未听取普京一方的说法”而受到美西方媒体的一致打压。^[4]

通过以上措施，美西方媒体的受众被海量的单向、同质化信息所淹没，几乎没有机会接触其他反方观点。所谓“信息茧房”原本指受众基于自身兴趣，只愿接收自己喜欢的信息，从而逐渐造成信息闭塞、“作茧自缚”的现象。^[5]而这里的“信息茧房”却并非受众主动选择，而是美西方媒体为其量身打造的，目的就在于彻底把控受众信息来源，扭转受众认知，从而掌握舆论战主导权。

（五）美西方利用网络新媒体，助力“虚假信息”超量生产与传播

乌克兰危机爆发后，美西方依据西方军事理论中一贯盛行的“绝对战

[1] Ben Collins and Natasha Korecki, “Twitter bans over 100 accounts that pushed #IStandWithPutin,” *NBC News*, March 5, 2022, <https://www.nbcnews.com/tech/internet/twitter-bans-100-accounts-pushed-istandwithputin-rcna18655>.

[2] James Clayton, “Twitter Moves to Limit Russian Government Accounts,” *BBC*, April 6, 2022, <https://www.bbc.com/news/technology-60992373>.

[3] Scilla Alecci, “German journalist dubbed the ‘Putin connoisseur’ had secret book deal with Russian oligarch,” International Consortium of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s, November 14, 2023, <https://www.icij.org/investigations/cyprus-confidential/german-journalist-putin-documentary-cyprus-secret-payments/>.

[4] Claudia Chiappa, “Tucker Carlson faces media fury over Putin interview,” *Politico*, February 7, 2024, <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journalists-fume-tucker-carlson-vladimir-putin-interview-russia/>.

[5] [美]凯斯·桑斯坦：《信息乌托邦：众人如何生产知识》，毕竞悦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8页。

争”思想，通过使用包括融媒体、短视频、社交媒体等在内的各类新媒体手段，大量炮制和传播各类反俄虚假信息，其目标是试图影响俄军士气和斗志，使国际社会对俄罗斯丧失信心，减少对其同情和支持。美西方的虚假宣传大致有以下内容：一是夸大俄军战场伤亡人数，渲染战争进程不利于俄；二是渲染俄国内政治和社会关系紧张、阶层矛盾激化、“将相失和”，俄民众抵制战争，政府“不得民心”；三是力证美西方国家的“集体制裁”对俄经济造成重创，俄民众生活困难。美西方借助无所不在的网络平台和社交媒体，炮制的虚假或不实信息一度泛滥，并在一定程度上收到了混淆视听的舆论战效果。

2022年3月28日，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网站刊登一篇题为“专家总结俄侵乌五种结束方式”的文章，宣称俄军伤亡巨大：“北约官员估计，冲突1个月以来，俄军伤亡及被俘人数已经高达4万人，有7名俄将领阵亡。”^[1]实际上，俄军伤亡人数可能远低于美西方媒体提供的数字，而乌军的伤亡率则较俄军高得多。例如，当年6月9日，英国《每日快报》网站刊登了一篇题为“‘以高达40比1的比例被击溃！’情报显示俄罗斯给乌克兰造成巨大损失”的文章，提到“目前有550名俄罗斯士兵被关押在乌克兰……相比之下，莫斯科俘虏了5600多名乌克兰士兵，其中2500人投降”。^[2]这篇报道提供的数据表明，在俄乌冲突初期，乌军被俘人数是俄军被俘人数的10倍。此种自相矛盾不啻是对美西方媒体虚假报道的反讽。

更有甚者，美西方势力还与乌克兰媒体及“网红”联手打造了所谓“蛇岛13勇士”“基辅幽灵”等虚假信息。蛇岛位于多瑙河口，开战前由一小队乌方士兵驻守。俄对乌开战首日，就出动海军陆战队攻占蛇岛并取得胜利。但是美西方媒体却将这场小规模战斗包装成视频故事大肆宣传，称守岛的

[1] Amy Mackinnon, Jack Detsch and Robbie Gramer, “Experts outline five ways Russia’s bloody invasion of Ukraine might end,” *Foreign Policy*, March 28, 2022,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2/03/28/russia-ukraine-putin-war-what-happens-next/>.

[2] Cally Brooks, “‘Outgunned by up to 40 to one!’ Intelligence reports find huge Ukraine losses from Russia,” *Daily Express*, June 9, 2022, <https://www.express.co.uk/news/world/1623301/ukraine-war-soldiers-outgunned-russia-vladimir-putin-intelligence-report-update>.

13名乌军士兵被“集体杀害”，以宣传俄军的“残酷暴行”。^[1]所谓“基辅幽灵”则是指2022年2月27日，乌方在推特帐户上发布了一段视频，显示一架乌军战机在基辅上空击落了一架俄战机，称赞这名乌战机飞行员神出鬼没、击落敌机，好像“基辅幽灵”，渲染乌克兰的“战绩”。^[2]事后证明，上述两个“故事”均为精心编造的虚假信息。

类似的假新闻伴随冲突进程层出不穷，如乌克兰第110独立机械化旅多次在其脸书账号上发布有关击落俄罗斯苏-25战机的“战报”，甚至包含2024年5月仅1个月就击落7架俄战机的“惊人”战绩，一度得到多方转载并广为流传。^[3]但随后有媒体发现，实际上所谓7架俄战机之中只有2架能得到证实^[4]，且该部队此前还曾在另一次战报中将电子游戏剪辑视频当做战果“证据”^[5]，可见其发布的历次“战报”可信度极低。这类虚假信息超量传播后，尽管偶有媒体“良心发现”进行核查与辟谣，但在此之前这些虚假信息已经造成负面影响，其舆论战效果不容低估。

值得注意的是，虚假信息在西方媒体上超量传播，虽然确实一定程度上对俄罗斯造成负面影响，但同时也出现“反噬”效应，即干扰了美西方自身对战争局势的判断。美国《华尔街日报》2023年末发表文章进行反思，承认西方媒体长期以来的对俄报道毫无根据，认为美西方有关“乌克兰将

[1] Dustin Siggins, “When it Comes to PR, Russia and Ukraine Aren’t Fighting the Same War,” *Newsweek*, Mar 14, 2022, <https://www.newsweek.com/when-it-comes-pr-russia-ukraine-arent-fighting-same-war-opinion-1686902>.

[2] Morgan Meaker, “How Ukraine Is Winning the Propaganda War,” *Wired*, June 13, 2022, <https://www.wired.com/story/ukraine-propaganda-war/>.

[3] Ellie Cook, “Russia Just Lost Another Su-25 Fighter Jet: Kyiv,” *Newsweek*, May 5, 2024, <https://www.newsweek.com/russia-su25-jet-ukraine-volodymyr-zelensky-1897426>.

[4] David Axe, “The Sukhoi Apocalypse Might Be a Myth—Ukraine Claims It Shot Down Seven Su-25s In A Month, But There’s Evidence For Just Two,” *Forbes*, May 27, 2024, <https://www.forbes.com/sites/davidaxe/2024/05/27/the-sukhoi-apocalypse-might-be-a-myth-ukraine-claims-it-shot-down-seven-su-25s-but-theres-evidence-for-just-two/?ss=aerospace-defense&sh=55ef1d893da1>.

[5] Matthew Loh, “A Ukrainian brigade appeared to use video-game clips to say it took down a Russian Su-25,” *Business Insider*, May 24, 2024, <https://www.businessinsider.com/ukrainian-brigade-seems-video-game-clips-downed-russian-su-25-2024-5>.

在西方先进武器的支持下迅速反攻”、“莫斯科将因普里戈任的叛变而发生政变”、“俄经济在西方制裁下已接近崩溃边缘”等预判事实上全都落空，这些对于俄罗斯的种种“奇思妙想”也欺骗了美西方自己，导致了“西方在俄乌战争政策上的失败”。^[1]

另一方面，俄罗斯也在充分利用自己在新媒体、融媒体、社交媒体、移动平台等方面的优长，反制美西方的反俄舆论造势活动。俄针对美西方联手打压俄官方和网络媒体的行为，迅速采取措施将美欧的一些反俄媒体关停或驱逐出境，如 2022 年 3 月 4 日颁布《第 32-FZ 号联邦法律》，用以处罚“虚假新闻”问题；同时限制 BBC、“美国之音”（VOA）、“德国之声”（DW）、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等多家西方媒体在俄业务，以回应这些国家对“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和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的禁令，并采取罚款、拒绝访问等措施，对“脸书”“推特”等社交媒体平台予以封堵。^[2]俄罗斯还利用国内各类媒体能够采取统一行动及目标较单一、集中的优势，有针对性、有重点地反击美西方在网络平台上的对俄舆论攻势。如俄“网红”密集在 TikTok 平台上发布以“俄罗斯人的命也是命”为标签的视频，支持俄对乌“特别军事行动”。^[3]

三、“混合战争”中国际舆论战的影响与发展趋势

（一）美西方针对俄罗斯的国际舆论战具有明显的“后真相时代”烙印 乌克兰危机场景下美西方对俄舆论战实践及其影响表明，在 21 世纪，

[1] Eugene Rumer & Andrew Weiss, “It’s Time to End Magical Thinking About Russia’s Defeat,” *Wall Street Journal*, November 17, 2023, https://www.wsj.com/world/russia/its-time-to-end-magical-thinking-about-russias-defeat-f6d0b8de?mod=hp_featst_pos4.

[2] Hannah Murphy et al., “Big Tech Caught in Information War between West and Russia,” *Financial Times*, March 1, 2022, <https://www.ft.com/content/e0a31741-ee65-42c0-b045-59c382a8a081>.

[3] Sarah E. Needleman and Deepa Seetharaman, “TikTok Influencers Get Spotlight in Information Battle over the Russia-Ukraine War,”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March 13, 2022, <https://www.wsj.com/articles/tiktok-influencers-get-spotlight-in-information-battle-over-the-russia-ukraine-war-11647185447>.

包括网络媒体、社交媒体、融媒体等在内的新传媒技术，具有受众覆盖面极广、传播速度极快、即时性舆论效应极大等传播特征，其国际传播效应远非节奏较慢的传统媒体如报刊、印刷品等可以比拟。此外人工智能技术使超量级的虚假信息得以被快速炮制和编造，在算法推送的加持下，被精准地投放到全球受众面前，将受众一切信息渠道从头到尾包裹、覆盖。由此，由包括网络媒体、社交媒体、融媒体、人工智能、算法推送等在内的新传媒技术掀起的超大规模的快速舆论“轰炸”，在一定时段内极可能扭曲事件进程，颠覆事实真相，影响甚至改变受众的心态和认知，从而产生颠倒黑白的负面舆论后果。而在政治社会生活节奏明显加快的现代社会，不但一般性事件、问题通常会在短时间走完发生、发展、结束的全部流程，即使是涉及一场影响甚大的大规模冲突或战争的叙事，也可能在极短时间甚至几星期、几天内就走完流程。事后受众即使知道了事实真相，明白被舆论欺骗了，但事件甚至战争进程已被扭曲，由此造成的后果也已是既成事实，其负面后果早就无法挽回。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所谓“后真相时代”。^[1]

在舆论战过程中，俄罗斯针对美西方势力铺天盖地的虚假信息宣传，虽然通过不断塑造、传播“新标签”“新符号”及设置新议程，起到一定的反制作用，但很难从根本上消除大量虚假信息传播造成的危害，相关舆论对冲进程产生的影响更是难以挽回。

（二）国际舆论战的功能明显增大增强，重要程度大幅提升

乌克兰危机期间，美西方与俄罗斯及双方媒体之间的舆论交锋及其影响表明，国际舆论战在“混合战争”中的功能明显增大增强，相比于其他手段方式，舆论战的重要程度大幅提升。随着现代高新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舆论信息可以在分秒之内传播到世界各地、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操纵公众认知，进而转化为影响战争各方优劣态势的重要因素。这使国际舆论战在“混合战争”中功能增强、斗争更激烈。参与的

[1] [英] 赫克托·麦克唐纳著，刘清山译：《后真相时代》，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9年版，第1页。

舆论战各方通过有针对性地引导和调控大众传媒、生产和筛选信息，一方面对己方可以鼓舞民心、激励斗志，产生强大的凝聚力；另一方面则可以摧垮敌对方的政治信念、销蚀其对抗意志，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因此，舆论战在国际地缘政治博弈中的作用正不断增大增强，成为信息化时代赢得战争的重要手段，甚至上升到了战略层面。正如美国战略学者、前助理国防部长约瑟夫·奈（Joseph S. Nye）所明确指出的，在乌克兰危机中，舆论战的作用十分重大。^[1]他认为，由于军事技术进步及核武器的超强威慑力、国家之间在经济及能源等方面的高度相互依存性、人们对平稳安定的高质量生活的依赖和观念也发生改变，使得与一战和二战规模和形态类似的实体军事战很难在 21 世纪再度重演。当前决定战争走向的不仅靠硬实力，也靠软实力，而后者更能长期地发挥作用，最后战争的结局绝不仅仅取决于谁的军队获胜，而是更取决于“谁的故事获胜”。^[2]

乌克兰危机已持续两年多，俄乌双方在军事实体战层面已陷入僵局，短期内都可能无法取得重大进展。但与正面战场不同，在 21 世纪“混合战争”场景下，双方围绕乌克兰危机展开的国际舆论战非但未能偃旗息鼓，反而愈战愈烈。如 2024 年 3 月 22 日在莫斯科近郊“克罗库斯城”音乐厅发生的造成 140 多人死亡、180 多人受伤的严重恐袭事件，招致国际社会的广泛谴责，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也特别发表声明敦促各国合作，追究策划实施者的责任。然而，责任归咎和追寻真凶这一问题却成了美西方与俄方进行国际舆论战的焦点。美西方齐声将恐袭罪责归咎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IS），极力撇清事件与乌方的关联，频频施放“烟幕弹”。俄方则针锋相对，指出乌方具有高度嫌疑，更直指“美国任何为乌方辩护的言辞都将成为犯罪证据”。^[3]

[1] Joseph S. Nye, Jr., “Eight Lessons from the Ukraine War,” Project Syndicate, June 15, 2022,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russia-war-in-ukraine-eight-lessons-by-joseph-s-nye-2022-06>.

[2] Ibid.

[3] 徐鸿波：《俄外交部：美国为乌克兰任何辩护的言论都应被视为犯罪证据》，央视新闻，2024 年 3 月 24 日，<https://news.cctv.cn/2024/03/24/ARTIjppaqyBxLGTVHFzgBDYm240324.shtml>。

尽管俄方多次提出调查证据及线索并提出质疑，但面对美西方所掌握的话语优势及其对俄舆论封锁，俄方声音在国际舆论场上始终影响力有限。日后即使真相大白，但在信息传播速度甚至高于受众认知速度的“后真相时代”，已存在的争议难以消除。这一事例再次凸显国际舆论战在“混合战争”中的独特重要性。

（三）舆论战乃至“国际代理人舆论战”将是“混合战争”的“新常态”

从乌克兰危机背景下美西方与俄罗斯的“隔空”舆论交锋过程看，美西方借助媒体新工具及其资金优势，不但可直接下场实施舆论攻击，为其“国际代理人”提供声援，也可通过提供各类支持，操纵“国际代理人舆论战”。美西方一方面全面动用其数量居多、技术居优的强大媒体工具，在战区外为其“支乌打俄”战略进行“隔空”舆论造势；另一方面，也以巨额资金及先进国际传播技术、装备、平台以及大量人力物力精心包装乌方媒体，使其担当对俄舆论战的“先锋”。这其中包括大力支持“电报”等应用软件，将其打造成双方开展舆论战的核心战场^[1]；也包括精心包装乌克兰“网红”，使之成为美西方开展对俄舆论战的网络“尖兵”。^[2]

历史上，交战各方进行“代理人战争”以及在国际舆论场开展“国际代理人舆论战”的案例不胜枚举。二战期间，德国为实现其独霸欧洲的侵略野心，曾在欧洲各国精心培育“第五纵队”，广泛开展“国际代理人舆论战”，为其侵占欧洲各国进行舆论造势活动。^[3]二战结束后，美国曾以打“代理人战争”的方式卷入印度支那战场，20世纪50年代初以法国殖民当局为

[1] Vera Bergengruen, “How Telegram Became the Digital Battlefield in the Russia-Ukraine War,” *Time*, March 21, 2022, <https://time.com/6158437/telegram-russia-ukraine-information-war/>.

[2] Chris Stokel-Walker, “The First TikTok War: How Are Influencers in Russia and Ukraine Responding?” *The Guardian*, February 26, 2022, <https://www.theguardian.com/media/2022/feb/26/social-media-influencers-russia-ukraine-tiktok-instagram>.

[3] [法] 马塞尔·博多等：《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百科全书》，曹毅风等译，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198—200页。

“代理人”，60年代初扶植南越吴庭艳政府为“代理人”，最终因无法达成目标而不得不直接登场。到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直接投入印支战场的军队已达到54.3万之多，伴随着军事实体战，其在舆论层面也采用了“国际代理人舆论战”模式。^[1]冷战结束后，美西方在针对非西方国家的历次战争中也不乏类似的情况。但与以往不同的是，在乌克兰危机背景下，美西方充分利用网络技术平台的高度发展，将这场“国际代理人舆论战”完全在战区之外开展，使之成为一场网络空间和“云端”上的隔空论战。美西方投入成本较低，但其国际传播效果、对战局的影响却堪比其“亲自下场”，一定程度上达到了“既可混水摸鱼，又不用弄湿鞋袜”的目的。

四、相关启示

综而论之，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美西方与俄罗斯之间的全面对抗具有经典的“混合战争”特性；同时，美西方与俄罗斯及双方媒体之间的舆论对抗则鲜明展示出21世纪“混合战争”条件下国际舆论战乃至“国际代理人舆论战”的新趋向：一是国际舆论战在“混合战争”场景下的作用增大，对战争进程及其结局的影响更大，在“混合战争”条件构成中的排位更加靠前。网络技术尤其包括融媒体、短视频、社交媒体、人工智能、算法推送等在内的高新传媒技术与载体的大发展对国际舆论战形态、进程、结果具有极大的影响。在未来“混合战争”场景下，谁拥有最新的网络传媒技术优势，谁就更能争取国际舆论战中的主动权。二是网络传媒新技术的发展，导致未来“混合战争”中更可能出现“虚假信息”满天飞的新舆论环境，甚至将舆论战转化为可彻底颠覆事实的“认知战”。而ChatGPT、Sora等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涌现和发展，更为有关势力塑造一种虚虚实实、难以捉摸的舆论环

[1] [美]亨利·基辛格：《越战回忆录》，慕羽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12年版，第42页。

境提供了更加便利的条件。三是技术先发国家在网络技术尤其是新媒体技术方面依然拥有较大优势。这些网络及新媒体技术的空前发展和应用，更便于这些国家及其媒体在当前条件下的国际舆论战中，针对技术后发国家对手一拥而上、以众欺寡。技术先发国家在未来“混合战争”条件下的国际舆论战中，更可能充分利用其网络新媒体技术和资金等优势，针对其对手或敌人，在战区遂行“国际代理人舆论战”。由此，我们可得以下启示：

其一，有关势力炮制的虚假信息在未来“混合战争”场景下的国际舆论战中更可能大量涌现、传播并产生极大的政治与战略后果。如何在未来国际舆论场中辨析、反击外部刻意炮制、大量散播的各类虚假信息，已经成为事关国家、民族胜败存亡的战略问题。在未来“混合战争”条件下，面对一些势力蓄意为之的各种污名化、妖魔化宣传及铺天盖地的虚假信息传播，如果仅仅是等待“用事实说话”这一超然姿态，无异于在尖锐、复杂的国际舆论斗争中消极退缩，难免不对自己的国家利益和国家形象造成损失。

其二，个别势力惯有的恃强凌弱、抱团压制新兴和发展中国家的本性，也始终与其力保相对于广大非西方国家的优越地位和世界霸权的战略需求有关，其未来还会纠结盟友对广大非西方国家进行舆论束缚、打压与围堵。如何在未来国际舆论场中，在媒体资金、技术、平台等方面相对弱势的条件下与有关势力进行舆论博弈，依然是广大非西方国家必须严肃思考的国际舆论战课题。

其三，由于俄罗斯在舆论攻防综合实力方面相对处于劣势，在乌克兰危机中与美西方的舆论交锋中总体上较为被动，主打防守反击。对于广大非西方国家来说，要在未来的“混合战争”场景下与有关势力进行国际舆论战较量时立于不败之地，有效抵挡外部极限抹黑和超量传播虚假信息的侵蚀，就必须全面适应先进传媒技术能够极大助推国际传播效能增强的新常态，更必须全面掌握与先进传媒技术相适应、科学性及其灵活性兼备的新传播手段，大力加强相关高新媒体技术研发和运用，增强自己的国际传播质效。

对中国而言，鉴于美方一些人一再把乌克兰危机与台海局势类比，甚

至不惜摆出围绕台海、南海等问题打一场针对中国的“混合战争”及国际舆论战的架势^[1]，中国非常有必要从美西方与俄罗斯之间的国际舆论战实践中汲取经验教训，着力建强自身对外话语体系，做到“内外兼修”、“敢打能胜”。一方面，对外应当联合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用反对霸权及强权政治这一利益交汇点，在国际舆论战中争取尽可能多的“战友”；另一方面，对内需加强自身建设，除了加大资金、装备、技术等投入之外，还要注重加强面向国际舆论战的人才培养。当前，为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号召，不少新闻院校及相关机构已开始着力培养国际传播人才。但国际传播不等于国际舆论战，培养人才更应培养敢“战”意识和胜“战”能力。必须具备敏锐的斗争意识和过硬的“作战”实力，未雨绸缪，才能为打赢未来“混合战争”场景下的国际舆论战做好充分准备。

【收稿日期：2023-09-11】

【修回日期：2024-05-30】

（责任编辑：马燕冰）

[1] “首相对‘以武力改变现状’深感担忧（「武力による現状変更」容認せず 安倍元首相と台湾・蔡総統が一致）”，《产经新闻》，2022年3月24日，<https://www.sankei.com/article/20220323-PD7QYETMM5NXPPU3ZJU2GY6BXY/>；共同社马德里2022年6月29日英文电，“北约视俄为直接威胁，并对中国警惕（NATO「ロシアは直接の脅威」12年ぶり戦略文書、对中国懸念）”，《北海道新闻》，<https://www.hokkaido-np.co.jp/article/699705>。